

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

周大鸣 主编

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 黄淑娉 著

民族出版社

黄淑娉 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黄淑娉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黄淑娉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10

(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丛书/周大鸣主编)

ISBN 7 - 105 - 05633 - 9

I. 黄… II. 黄 III. ①人类学 - 文集 ②民族学 - 文集
IV. ①Q98 - 53 ②C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933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0001 - 2000 册 定价: 2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1950年夏作者（左一）在内蒙古呼纳盟调查，左二为历史学家蔡美彪教授。



1950年夏作者（左）在内蒙古呼纳盟草地调查时坐牛车行进。



1953年夏作者（前排右一）在福建罗源县八井畲族村调查，后排右一为施联朱教授。

1995年作者（右）重访粤东风凰山区山犁畲族时，与40年前的调查对象吴段重逢。





1980年夏作者(右二)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勐昂寨调查。



1980年夏作者(右三)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调查。



1980年夏作者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族村寨调查。



1984年夏调查云南宁蒗摩梭人，作者(中)与摩梭姑娘和她的普米族丈夫合影。

1984年夏在摩梭人住房院子，作者背后的住房上层是摩梭女性接待男朋友的房间。



1984年作者在云南澜沧县南段乡与拉祜族女乡长合影。



1991年夏作者在贵州雷山县苗族地区调查。





作者与苗族小学生



作者（后排左一）
与龚佩华教授在贵州
榕江县寨头村与侗族
语言学者石宗庆夫妇
合影。



1993 年作者在广
东台山市美琴村调查，
曾是世仆的 94 岁老人
谢长女喜迁新居。



1992 年作者考察
美国华盛顿州玛卡印
第安保留地，摄于遗
址博物馆。

总 序

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百年的历程,自严复 1901 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来,几代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使人类学在华夏大地传播,成长,生根,发芽,几番风雨,茁壮成长。人类学是一门改革和发展的学科,它以探索人类文化的奥秘为使命,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必将不断显示出她的独特魅力。

经历几代学人辛勤耕耘和学界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反思,中国人类学者创建中国人类学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形成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要使中国人类学立足于世界同行之林,要使我国人类学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移,不仅需要及时了解全球最新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把握人类学发展的大趋势,同时需要我们真正消化前辈学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使人类学更好地与中国的文化特色和学术传统相结合。随着全球学术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学术发展的势头一日千里,理论流派日新月异,整理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著作,引进和翻译国外学者的著作,出版新的研究论著,必须齐头并进,刻不容缓。只有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博采众长的土壤下,通过全国学者的通力合作,厚积薄发,才能催生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作为中国大陆复办的第一个系,承担学科建设的重任,义不容辞。我们计划出版《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学人就掀起了把人类学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第一轮高潮。中山大学,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

人类学的拓荒者。当时齐名中国的“南杨北吴”，分别指杨成志和吴文藻先生。其中杨成志先生就是当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1935年，杨成志先生担任中山大学人类学部主任，后来又创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1935年到1949年期间，先后培养了戴裔煊、王兴瑞、江应樑、王启澍、梁钊韬、曾昭璇、吕燕华、容观复、张寿祺、刘孝瑜等10位研究生。1981年，在中山大学梁钊韬先生的积极争取下，人类学系得以复办，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系，梁钊韬先生任系主任。1982年人类学系获得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人类学博物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山大学成为人类学在南方的学术重镇。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思想，是人类学重点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这次《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首批整理了杨成志、容观复、黄淑嫔、龚佩华四位先生的文集。四位先生怀着对学术的赤诚，以满腔的热情，先后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耕耘，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这些成果是作者长年田野调查与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人类学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最好范例，实践了杨成志先生所言：“我们的研究路线，要由‘脚’爬山开踏出来，却不要由‘手’抄录转贩出去。”

重读华章，催人奋进。一字一句，闪烁着杨成志、容观复、黄淑嫔、龚佩华四位先生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示，为今天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根深方叶茂，正是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人类学的优良传统得以薪尽火传。今后，中山大学人类学必将进一步立足于田野，立足于本土，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合作，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把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人类学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周大鸣

2003年9月2日

目 录

绪论：从异文化到本文化

- 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忆…………… (1)

文化人类学理论探寻

- 论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29)

- 人类学的社会进化观及其批评的辨析…………… (43)

-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59)

进化学派的人类学与马克思

- 读《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74)

童养媳婚不能为韦斯特马克的“性嫌恶论”辩解

- 读《韦斯特马克的复活》有感…………… (8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原始社会史

- 研究的贡献…………… (97)

略论亲属制度研究

- 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 (115)

- 关于早期婚姻家庭形态研究的几个问题…………… (130)

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发展我国的民族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49)
中国民族学要有自己的特色	(158)
从西方学者看中国民族学说起	(162)
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	(170)
The Criteria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185)
批判地继承 积极地创新	(194)
论环状联系婚与母方交错表婚	(198)
中国人类学源流探溯	(214)
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和人才	(239)
略谈民族文化特点研究	(251)
我的人类学人文观	(262)

少数民族“异文化”调查与研究

拉祜族的家庭制度及其变迁	(279)
改革开放中两个苗寨的变迁	
——黔东南西江、金井苗寨调查报告	(293)
寻找失去的文化	
——玛卡印第安保留地考察记	(311)
文化变迁与文化接触	
——以黔东南苗族与美国西北海岸玛卡 印第安人為例	(321)
重访山犁畲村 再谈民族认同	(336)

汉民族“本文化”调查与研究

大力开展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	(351)
广东与香港的区域文化研究	
——人类学个案研究浅析·····	(354)
从体质特征和文化遗产看广东族群关系·····	(369)
从广东汉族三民系的文化习俗看古越人的 文化遗产·····	(379)
广东“细仔”制度研究·····	(391)
广东台山“细仔”制·····	(410)
珠玑巷·冈州·四邑文化·····	(420)
从一个村庄看侨乡台山社会变迁·····	(434)

绪论：从异文化到本文化 ——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回忆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异文化”与“本文化”

人类学以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对科学做出了贡献。田野工作就是对所研究的社会作实地调查，这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文字记录及考古等有关资料进行研究，解决要研究的问题。

早期西方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社会，着重研究遗留至近现代的原始文化。西方人类学者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文化，这些文化对人类学者来说是异文化。异文化，英文作 *other cultures*，或作 *foreign cultures* 等。“异”是与自己相对的，不同于自己的，即 *the other*，译作“他者”。异文化不是研究者本身所源自和熟悉的文化，而是其他族群的文化。与异文化相对，本文化指研究者所源自的、长期生活于斯的本土的文化。

人类学传入中国以后，20 世纪前期我国老一辈人类学者讨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时，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体质和文化的学科，原始文化应是研究的重点。因此，1949 年以前，受西方传统的影响，我国人类学主要以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大多数是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对异文化的研究。同样，少数民族学者研究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研究异文化。

在人类学者心目中，“异文化”一词没有歧视之意。早期西方人类学者研究非西方世界、原始部落社会的文化，一般都以同

情的目光关注被殖民者统治的民族命运。许多研究者在离开了他们的调查地点以后，总是禁不住表达对远方文化的怀恋。^①

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人类学者大多数还是汉族人。随着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或与汉族学者合作，或取代汉族学者而研究本文化，这是可喜的现象。20世纪下半叶仍然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究其原因，除了受旧学术传统习惯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必须适应和服从国家的民族工作的需要，因而把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少数民族。但是从学科的内容和发展来说，民族学、人类学对中国民族的研究都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不应有所偏废。作为研究者本身，从学科的需要出发，他们深感研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我国人类学应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地理上的中国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再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②。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执教时，邀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校讲学，并倡导社区研究，安排学生做田野调查。30年代费孝通先生与王同惠女士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③，又在江苏吴江县汉族开弦弓村调查写出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

① 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出版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其中有责骂他的心爱的土著的文字，为此曾在西方人类学界引起了一场风波。我赞成李亦园教授在《寂寞的人类学生涯》一文中的评论，他认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人总是人，人类学家在田野一久，总不免有些牢骚，那就是源于长久的寂寞之故。”

② 吴文藻为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所写的《导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③ 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1936年。

生活》^①。林耀华先生于1935年调查福建义序的宗族社会，写成《义序的宗族研究》^②；1943年调查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出版《凉山彝家》^③；40年代初写成《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④。193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学生陈礼颂在吴文藻的指导下，在他的家乡广东潮州做田野调查，写成《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⑤。对福建义序和潮州斗门乡的研究，真实地描述了华南典型的村落社区，再现了闽粤的宗族社会，尽管晚了半个多世纪才出版，仍然是十分珍贵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杨庆堃的《华北一个集市的经济》、杨懋春的《中国的一个乡村：山东台头》等。

上述研究是老一辈学者早期所做的包括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的范例，其后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1989年费孝通发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文章，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⑥，1991年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文还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限于少数民族，不包含对汉族的研究，理论上说不过去。^⑦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939年伦敦英文版。

②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③ 林耀华：《凉山彝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④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⑤ 陈礼颂：《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⑥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⑦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二、“异文化”调查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我于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民族学系，当时社会学、人类学已被取消，二者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苏联一向使用民族学名称，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下，民族学这个名称可以存在。这样，社会学系改为民族学系（系中另一部分改为劳动学系后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来有人类学传统，改称民族学系以后更着重使学生受人类学的训练。50年代初组织学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牧区和北京郊区清河汉族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从1950年夏天的调查算起，20世纪下半叶的每一个十年，我都曾多次在少数民族地区作调查，90年代除了调查少数民族之外，主要从事广东汉族的人类学研究，在汉族地区调查，直到2001年夏天，参加田野调查工作前后有50年。其中前四十年研究异文化，后十年研究本文化。本文回顾个人参加田野调查的历程，将粗浅的体会作一简述，可惜50年代和60年代的调查资料已于“文化大革命”大浩劫中全部丢失。

我在蒙古、苗、瑶、畲、壮、侗、傣、黎、彝、哈尼、拉祜、纳西（摩梭）、基诺、布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做过长期或短期的调查。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特别是在早期；个人或应邀与兄弟单位合作研究课题；指导研究生调查研究和本科生的调查实习。对少数民族的调查实践，使我具体认识我国各族文化的多样性。这里从认识不同人文类型、区分民族的标志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三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其实这三者之间互相联系，并不是说某一个民族的事例只能说明某一个方面，而只是作为例证说明我通过调查实践对这三个方面的体会。

1. 认识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类型

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在内蒙古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牧

区实习。1950年暑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历史系三校师生25人在林耀华、陈永龄教授率领下进行这次民族调查，历时两个半月。内蒙古已于1945年解放，194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对当时全国还未全部解放便到此地来做实地调查的首都高校师生，给予特殊的关照，负责全部食宿旅行费用。我们在海拉尔接受了骑马的训练，然后进入草地，呼盟是我国著名的牧区。那时还未进行民族识别，调查所到之处实际包括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族，还访问了红华尔基的俄罗斯族，以调查蒙古族为主。第一次领略草原生态环境和牧区猎区风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一切都那么新奇有趣。有时骑马驰骋，更多的是坐两个大轱辘的牛车，两个人一辆，在草地行进时和晚上住宿也都在牛车上。住蒙古包，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分组从不同路线进行调查，我在索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我第一次学写民族志，初步学习调查方法，体会党的民族政策，产生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感情以及学习人类学的浓厚兴趣，表示决心到边疆去。集体撰写的调查报告包括史地、经济、政治、家族、文教等方面内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呼盟境内少数民族所做的调查，具有真实性和资料价值，调查报告在47年以后于1997年由当地出版。^②

除了内蒙古之行外，以后的半个世纪，我的研究领域一直在南方，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36年中，前期研究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后期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因此我的调查地点基本在南方。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主张要学会调

① 敕勒歌。

② 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呼伦贝尔盟民族事务局整理：《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